



大会

Distr.: General
21 July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六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71(a)

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

为农村地区女童增进福祉、增强权能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大会第 [74/134](#) 号决议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包括说明会员国为增强农村地区女童权能而改善社会、经济和政治投资的情况，以期评估本决议对女童福祉的影响。本报告述及在支持农村地区女童的法律和规范框架方面取得的进展，为增强这些女童权能而进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投资以及相关挑战。本报告为继续取得进展提出了建议。

* [A/76/150](#)。



一. 导言

1. 农村地区的女童和妇女由于地处农村和性别歧视，面临各种根深蒂固的挑战。然而，对这个群体不能一概而论，她们的遭遇复杂多样，表明在增强社会、经济和政治权能方面通常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包括在以下领域面临不平等和排斥：获得卫生保健服务、艾滋病毒防治、性和生殖健康服务、教育、土地所有权、水和环境卫生、参与社会决策结构、农业和其他劳动力市场以及公平公正就业。在全球范围内，女童经常面临严重的歧视、暴力、性剥削和性虐待、粮食不安全、无偿工作、强迫婚姻、童工、人口贩运和有害社会文化规范等问题。¹

2. 尽管存在这些巨大的挑战和障碍，但世界各地显然仍以各种方式为增强农村女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能进行投资。

二. 法律和规范框架及承诺

3. 各国有义务落实所有女童的权利，消除对她们一切形式的歧视。这是《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相关国际法律框架和基本人权条约所规定的。特别是，《儿童权利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强化了公约缔约国根据该公约平等、一视同仁地确保所有儿童的权利的义务。

4.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大会有关决议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的几项公约也包含相关义务。

A. 国际和区域层面的进展

5. 早期努力首先侧重于需要改善农村地区妇女和女童的生活，这为最近取得的进展铺平了道路。例如，25 年前，1995 年《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首先强调，需要改善农村妇女和女童的生活。此外，2015 年通过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会员国提供了加快推进性别平等、增强农村地区妇女和女童权能的机会。

6. 2018 年，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宣传“实现性别平等及增强农村妇女和女童权能”这一主题，突出农村地区残疾女童的状况，强调需要加强框架和政策，推动增强农村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7. 仍是在 2018 年，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发布关于气候变化背景下减少灾害风险所涉性别方面的第 37(2018)号一般性建议，指出农村妇女和土著妇女(进而包括女童)作为粮食生产者和农业工人，直接受到气候变化和灾害的影响。

8. 2020 年，劳工组织 1999 年《消除最有害的童工形式公约》(第 182 号公约)成为第一个获得普遍批准的劳工组织公约。该《公约》要求采取措施消除最有害

¹ 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和粮食署，《北京 25 年后的农村妇女和女童：积极变革的关键推动者》(2020 年，罗马)。见 <http://www.fao.org/3/cb1638en/cb1638en.pdf>。

的童工形式，其中包括消除农村地区女童的童工形式。此外，大会宣布 2021 年为消除童工现象国际年。

9. 近年来，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一直呼吁，开展全面的提高认识运动，反对视童婚为正当做法的文化态度，并建立机制，对所有婚姻进行登记，特别登记农村、偏远和土著地区的婚姻，因为在这些地区女童面临的童婚风险更大。2019 年“访问尼泊尔：暴力侵害妇女、其原因及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A/HRC/41/42/Add.2)是相关报告。

10. 在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 25 周年之际，2019 年内罗毕首脑会议收到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关于制止有害习俗的 400 多项承诺，其中近四分之一明确包括消除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和结合的行动。这些有害习俗对农村地区女童的影响特别大。

11. 2020 年，非洲联盟通过了 2020-2030 年消除童工、强迫劳动、人口贩运和现代奴役十年行动计划。非洲联盟 2019-2023 年战略也加强了其在非洲制止童婚运动(2014-2018 年)。2018 年，欧洲委员会会议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欧洲强迫婚姻的决议。2019 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第一夫人联盟签署了《西非经共体第一夫人尼亚美宣言：呼吁制止童婚，促进女童教育和赋权》。

B. 国家层面的进展

12. 会员国已采取步骤，促进增强农村妇女和女童权能，为此将这一问题纳入国家法律、政策、方案、战略以及根据国际公约和框架开展的活动。

13. 例如，在马来西亚，“2030 年农村发展政策”述及农村地区女童等青少年的教育和增强权能问题。同样，在萨尔瓦多，国家全面保护儿童和青少年政策包括聚焦性别和农村地区的目标。阿塞拜疆共和国新的《2020-2030 年儿童战略》旨在为包括各地方或边远地区女童在内的儿童创造平等机会。秘鲁的国家气候变化战略在农村发展工作中纳入了性别和跨文化方法方面的考虑。2020 年，意大利设立基金，鼓励女性在农业领域进行创业。

14. 在澳大利亚，“减少暴力侵害妇女及其子女国家计划(2010-2022 年)”旨在专门为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妇女和儿童提供在文化上适当的举措。2020 年，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根据与地方和边远地区土著妇女和女童的多年磋商发布了一份报告。²

² Allyson Campbell and others, *Wiyi Yani U Thangani (Women's Voices): Securing Our Rights, Securing Our Future* (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2020)。见 <https://apo.org.au/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files/2020-12/apo-nid310043.pdf>。

三. 为增强农村地区女童权能而作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投资

A. 贫困与社会包容

15. 世界上大量最贫困人口是女童和妇女，这些人的生活条件令人无法接受，通常是生活在农村地区。多边组织、各国政府以及民间社会组织和网络进行干预工作，以期改善她们的生活条件，增强其权能。

16. 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和乐施会美国分会通过 R4 农村复原力倡议为增强农村地区女童和妇女社会权能进行投资。该倡议旨在使弱势农村家庭能够增加收入保障。在东部和南部非洲，青年农民田间学校和生活学校方案培养农村地区女童的农业、创业和谋生技能。

17. 干预措施还旨在克服农村和偏远地区女童和其他人在记录方面遇到的障碍。例如，在利比里亚，通过 2019 年扩大出生登记服务覆盖范围方案，在 4 个农村州的医院和区办事处增设了 14 个出生登记中心。在印度，通过将独特身份证号码与出生登记相关联的创新方案，增加了农村社区对出生登记的需求。在海地，新的登记官和神职人员接受培训，以便为最偏远的地区服务。³

B. 教育

18. 通过教育投资，正在实现受教育权的女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1995 年以来，中小学女童入学人数增加了 1.8 亿，女童在阅读和数学方面的成绩优于男童或与之持平。⁴ 尽管如此，教育中的性别差距仍然存在，特别影响到女童，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女童。

19. 女童教育投资可带来多种好处，包括改善她们日后的就业及经济前景，增强其社会保障。女童如果能够获得优质教育，则不太可能早婚或成为童工，而是更可能正规就业，收入更高。⁵

20. 然而，许多女童包括生活在偏远或服务不足地区的女童仍然面临多重不利条件，使她们无法完成学业。在这方面，保护农村地区女童的家庭不受经济冲击，并通过现金转移方案等方式激励家长让女童继续上学，是关键干预措施。

21. 即使在学校，许多女童也没有获得日后所需的各种基础性、可转移性、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数字、创业和特定工作技能。一些方案直接针对这种情况，例如巴西的一个方案着重向戈亚斯农村的女童传授电子学、计算机编程和机器人

³ 儿基会，《目标领域 3：保护每个儿童免遭暴力和剥削——2019 年全球年度成果报告》(2020 年，纽约)。见 <https://www.unicef.org/media/73766/file/GARR-2019-Goal-Area-3-2020.pdf>。

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0 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性别报告——新一代：在教育中实现性别平等的 25 年努力》(2020 年，巴黎)。见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5469>。

⁵ 世界银行，“一半的人口没有机会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日期不详)。见 <http://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924471541079772899/pdf/131634-BRI-girls-PUBLIC-Series-World-Bank-Education-Overview.pdf>。

技术。其他方案旨在建立吸引和部署合格教师到农村地区的制度，因此近年来拥有这种制度的国家数量有所增加。⁶

22. 在为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而转用远程学习平台的情况下，各机构进行投资，支持为农村地区女童等所有儿童提供强有力的教育对策。例如，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联合国女童教育倡议、国际计划和马拉拉基金编写了“平等重建：女童返校指南”，帮助应对因疫情学校停课造成的性别层面问题，包括应对农村地区出现的问题。

23. 随着学校重新开学，一些国家把重点放在增加对女童的支持上，例如为孕妇和年轻母亲提供重返学校的指导方针，预防和应对校园性别暴力机制，以及防止长期学习损失的补救教育方案，其中一些方案专门面向农村地区女童。

C. 保健与艾滋病毒

24. 为改善农村地区女童获得卫生保健的机会进行了多项投资。例如，泰国正在升级偏远地区的地方卫生中心，并推广侧重于产前产后护理、疫苗接种、母乳喂养支持和其他领域的流动单位。在阿富汗，扩大流动诊所的规模，为偏远地区的 140 多万弱势妇女和儿童提供服务。⁷ 在也门，儿基会、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和地方当局在农村地区建立社区卫生工作人员网络，为难以接触到的女童、男童和家庭提供基本卫生保健。⁸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重点是，在因 COVID-19 大流行而实行限制后，确定和应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难以到达的偏远地方以及西岸偏僻难民社区内女童和男童的迫切需求。其工作包括扩大流动卫生保健服务和食品递送范围，并提供月经卫生包，包括为残疾女童提供月经卫生包。⁹

25. 过去十年，在流行病负担重的国家，通过采取一致行动，确保国家方案充分推广旨在惠及女童和女青年及其性伴侣的应对措施，包括投资促进性和生殖健康及生殖权利，以及综合预防和治疗方法，感染艾滋病毒的青春期女童和女青年(15-24 岁)的人数略有下降。¹⁰ 例如，联合国各实体和其他机构通过提高认识行动、提供性和生殖健康信息、传授谋生技能和财务管理知识，努力促进增强女童权能，特别是增强感染艾滋病毒女童和农村地区女童的权能。

⁶ 儿基会，《目标领域 2：每个儿童都能学习——2019 年全球年度成果报告》(2020 年，纽约)。见 <https://www.unicef.org/media/71801/file/Global-annual-results-report-2019-goal-area-2.pdf>。

⁷ 儿基会，《性别平等：2019 年全球年度成果报告》(2020 年，纽约)。见 <https://www.unicef.org/media/71421/file/Global-annual-results-report-2019-gender-equality.pdf>。

⁸ 儿基会，《目标领域 1：每个儿童都能生存并茁壮成长——2019 年全球年度成果报告》(2020 年，纽约)。见 <https://www.unicef.org/media/72471/file/Global-annual-results-report-2019-goal-area-1.pdf>。

⁹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2020 年残疾包容年度报告”，2020 年。见 https://www.unrwa.org/sites/default/files/content/resources/unrwa_disability_inclusion_report_2020_final.pdf。

¹⁰ 全球艾滋病毒预防联盟，《执行 2020 年艾滋病毒预防路线图：第四次进展报告》(2020 年，日内瓦，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艾滋病署))。见 https://www.unaids.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_asset/fourth-annual-progress-report-global-hiv-prevention-coalition_fr.pdf。

D. 暴力、性虐待和性剥削

26. 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投资，以减少对农村地区女童等儿童的暴力、性虐待和剥削行为。例如，为减少学习环境中的暴力，儿基会及其合作伙伴发起了制止暴力全球联盟和安全学习倡议。为了解决农村地区女童等儿童在网上遭受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24 个国家已经实施 WeProtect 全球联盟制订的国家应对模式，该联盟与信息 and 通信行业合作，以消除这一祸害。

27. 2020 年，由于疫情而进行封锁和关闭学校，各家庭在照顾子女方面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有鉴于此，儿基会注重采用多部门办法，预防家庭暴力和虐待，包括预防暴力侵害农村地区女童行为，为此减少导致这种行为的因素并培养父母应对压力的能力。在这方面，儿基会增加了对敏感对待性别问题儿童求助热线的投资，并确保农村地区女童等儿童及家庭都能获得服务。疫情期间，儿基会还努力加强女童和男童的精神健康与社会心理支持，包括在农村地区，为此在 116 个国家提供安全空间、同伴活动、非专业心理支持和临床精神健康护理等服务。¹¹

28. 为减少农村地区女童和女青年等弱势青少年遭受暴力和剥削的风险，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供谋生技能和法治方面的支持。例如，在非洲、中亚、中东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 12 个国家就消除有害的性别陈规定型观念开展了体育方面的谋生技能培训。

E. 有害习俗

29. 童婚和切割女性生殖器数目仍然很高，不过根据儿基会在 COVID-19 大流行之前的报告，近年来这些有害做法已大幅减少。在农村地区，由于根深蒂固的保守社会规范和做法，消除这些做法可能更具挑战性，因此这些有害做法对农村女童的影响尤其大。

30. 为消除童婚进行的投资着眼于解决贫困、社会排斥和教育障碍等根本原因以及增强女童权能，重塑社会期望，改善获得安全优质教育的机会，加强女童的经济独立性，并制定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厄瓜多尔、埃及、几内亚、印度、马耳他、尼泊尔、卢旺达、塞内加尔和多哥等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实施这类方案。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儿基会消除童婚现象全球方案支持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中东和北非以及南部非洲的区域努力。

31. 人口基金和儿基会继续牵头实施废除女性生殖器切割联合项目，该方案致力于在 16 个重点国家提供预防和保护服务。此外，儿基会还通过聚光灯倡议等方式在其他地方开展工作。这些努力包括推动公开声明反对切割女性生殖器，建立社区监测结构，与男子和男童接触，增强女童权能以及促进社区提高认识和司法行动。例如，布基纳法索在农村和偏远地区设立了 3 个流动初审法院，使 115 人因涉嫌切割女性生殖器被捕，34 人被定罪。¹²

¹¹ 儿基会，《目标领域 3》。

¹² 同上。

F. 粮食和营养

32. 自 2000 年以来, 由于会员国、多边机构和其他方面投资解决粮食不安全和儿童营养问题, 世界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的比例减少了三分之一。同样, 今天纯母乳喂养的儿童比 2000 年多 8 000 万。¹³

33. 联合国营养问题行动十年(2016-2025)是世卫组织成员国的一项重要承诺, 旨在确保持续执行营养政策和方案, 包括面向农村地区女童的政策和方案。2020 年, 儿基会加快提供预防儿童早期发育迟缓和其他形式营养不良的服务, 包括为农村地区女童提供服务。例如, 在儿基会的支持下, 马里培训女性领导人以社区为基础为农村和边缘化社区的母亲开展提高认识活动。¹⁴

34. 2019 年, 粮食署向农村和城市地区的 1 730 万儿童(其中 50%是女童)提供学校供餐, 并将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纳入其营养方案。¹⁵ 在学校停课期间, 粮食署调整方案, 将校内餐换成可带回家的口粮。

35. 就预防土著女童和偏远或农村地区儿童等最弱势儿童营养不良的重要性提供证据至关重要。为此, 粮食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儿基会和民间社会合作伙伴于 2019 年在南苏丹开展了数十次快速反应任务, 以改善偏远地区最弱势儿童和妇女的待遇公平状况。¹⁶

G. 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36. 2020 年, 在儿基会的支持下, 730 万妇女和女童获得了安全饮用水, 900 万妇女和女童获得了基本环境卫生服务, 其中大部分在农村地区(在报告按性别分列数据的国家)。推广性别友好和性别隔离卫生间, 对青春期女童进行安全、可靠和有尊严的经期保健和个人卫生至关重要。2020 年, 儿基会帮助 3 800 多所学校配备男女童分开的环卫设施, 其中 80%的学校位于农村地区。

37. 需要了解农村地区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需求及其性别层面的情况, 以指导为改善女童生活进行有效投资。在这方面, 例如, 柬埔寨政府已将其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管理信息系统扩大到农村地区, 并按性别和其他因素对数据进行分类。¹⁷ 另一个例子是, 苏丹启动了对学校用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首次

¹³ 预测基于儿基会/世卫组织/世界银行集团联合营养不良估计工作组进行的分析。见儿基会、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 “联合营养不良估计数: 2019 年版的主要发现”, 2019 年 3 月。见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unicef-who-the-world-bank-group-joint-child-malnutrition-estimates-levels-and-trends-in-child-malnutrition-key-findings-of-the-2019-edition>。

¹⁴ 儿基会, 《目标领域 1》。

¹⁵ 粮食署, WFP/EB.A/2020/4-A 号文件。

见 <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16867/download/>。

¹⁶ 儿基会, 《目标领域 1》。

¹⁷ 儿基会, 《目标领域 5: 每个儿童都有公平的人生机会——2019 年全球年度成果报告》(2020 年, 纽约)。见 <https://www.unicef.org/media/72341/file/Global-annual-results-report-2019-goal-area-5.pdf>。

全国评估，其中研究了城乡差距、获得私人洗漱和经期保健以及个人卫生设施的机会等影响农村地区女童的种种问题。¹⁸

H. 农村地区女童的参与情况

38. 女童参与影响其生活的决策，有助于加强民间社会、推进问责、增强社会凝聚力和推动制定有效政策。建设和加强战略平台(如儿童议会和儿童俱乐部)、与决策者的对话机制和技能发展都有助于推动女童的参与。

39. 在尼泊尔，儿童友好型地方治理战略将女童和男童参与规划委员会的工作制度化，包括在农村社区。国际电信联盟与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联合实施“非洲女童会编码”倡议，使包括农村地区女童在内的女童能够学习信息和通信技术并从事相关职业。

40. 聚焦 COVID-19 预防和应对工作的倡议也涉及女童和妇女，包括农村地区的女童和妇女。例如，在伊拉克，500 多名女童和女青年担任 COVID-19 同伴教育者，与 17 000 多名女童和女青年接触。在不丹，2 000 多名女童子军传播信息，帮助遏制病毒蔓延。在全球范围内，儿基会根据疫情对其青少年表达和创新工具包的一个版本进行调整，并推动扩大实施规模。

四. 疫情的挑战和影响

A. 持续贫困、歧视和遭受剥夺

41. 对农村妇女和女童而言，由于负面社会文化规范、歧视性的性别规范和其他复杂限制持续存在，她们仍难以获得土地、服务、生产性资源、基础设施、社会保障、金融服务和其他资产。这最终限制了她们自主决策的能力，使她们被排除在机构、治理、领导和决策结构之外，或在其中代表性不足。此外，贿赂和以性为钱等一些腐败形式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尤其严重，进一步限制了她们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在农村地区尤其如此。¹⁹

¹⁸ 儿基会，《目标领域 4：每个儿童都生活在安全清洁的环境中——2019 年全球年度成果报告》(2020 年，纽约)。见 <https://www.unicef.org/media/71336/file/Global-annual-results-report-2019-goal-area-4.pdf>。

¹⁹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时机已到：解决腐败的性别层面问题》(2020 年，维也纳)。见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corruption/Publications/2020/THE_TIME_IS_NOW_2020_12_08.pdf。

42. 在实施社会保障方案时，农村地区往往被落在后面，特别是妇女和女童常常被排除在农村扶贫计划之外。即使在 COVID-19 大流行之前，农村和农业发展援助内旨在改变消极性别角色和增强农村地区妇女和女童权能的项目也只占一小部分。疫情暴发后，只有少数几个低收入国家着手为应对 COVID-19 采取社会保障措施，这些措施大多是行政调整、实物转让、学校供餐和公用事业费用豁免。²⁰

43. 特别是，在世界许多地区，农村地区的土著妇女和女童继续面临严重的歧视和不被承认的问题。鉴于妇女和女童总体上缺乏收入来源和储蓄，以及没有能力影响有关自己生活的决定，因疫情保持身体距离和限制行动可能会加重她们的经济困难、贫困和遭受剥夺的程度。²¹

44.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地区的残疾女童往往面临基于残疾和性别的多种形式的歧视，而缺乏获得水、卫生设施、卫生保健和教育的机会使这些歧视更加严重。²²

B. 教育限制

45. 在全球范围内，失学女童多于男童，而贫困和地处农村则会加剧女童相对于男童的劣势。例如，在阿拉伯地区，据记录，农村地区的残疾女童和妇女识字率、受教育程度和就学率最低。²³

46. 农村地区女童在寻求获得优质教育时面临着诸多障碍，包括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家庭贫困、地理位置偏僻、政治边缘化、父母的态度、离学校太远以及学习环境中的安全和卫生设施不足。全球只有 53% 的学校配备了提供肥皂和水的洗手设施，而肥皂和水是经期个人卫生管理的必需品。此外，职业培训等校外教育机会可能与农村地区女童不相关或不向其提供。失学青春期女童包括农村地区的青春期女童，比在校女童更容易受到强迫婚姻、早孕、暴力和人口贩运的伤害。²⁴

47. 关于农村地区或土著社区的妇女和女童的教育参与和学习成果情况的分类数据有限。大多数国家只跟踪入学率，而不跟踪毕业率，但较好的衡量标准是出

²⁰ 粮农组织，《农村地区的社会保护和 COVID-19 应对措施》，2020 年 4 月 8 日；粮农组织，“农村妇女：争取实现性别变革性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全球论坛，在线讨论摘要，2017 年第 142 期。见 <http://www.fao.org/policy-support/tools-and-publications/resources-details/fr/c/1270751/>；<http://www.fao.org/3/bs946f/bs946f.pdf>。

²¹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署，《北京 25 年后的农村妇女和女童》；粮农组织，“社会保护与 COVID-19”。

²² 《2018 年残疾与发展问题报告：由残疾人、为残疾人和与残疾人一起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出版物，2019 年）。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关于农村妇女权利的第 34(2016)号一般性建议。见 <https://social.un.org/publications/UN-Flagship-Report-Disability-Final.pdf>；<https://undocs.org/pdf?symbol=fr/CEDAW/C/GC/34>。

²³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2018 年阿拉伯区域残疾问题》（2018 年，贝鲁特）。见 https://www.unescwa.org/sites/default/files/pubs/pdf/disability-arab-region-2018-english_1.pdf。

²⁴ 教科文组织，《2020 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署，《北京 25 年后的农村妇女和女童》。

勤率，因为女童出勤率可能由于下列因素而降低：家庭责任、外出工作、缺乏适当的卫生设施、童婚或怀孕或学习环境中的性别暴力和骚扰。²⁵

48. 学校因疫情停课对儿童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他们往往依赖学校的营养、社会心理支持和保健服务。由于学校供餐方案减少或中止，农村地区的儿童还有可能在有害条件下工作并遇到营养方面的挑战。这场疫情可能使陷入童婚、遭受性别暴力和性暴力的女童数量增加。²⁶ 在 COVID-19 危机早期，用于性和生殖健康服务以及艾滋病毒检测、预防和治疗的重要资源可能已被挪用。²⁷

49. 在农村地区，由于社会和性别规范倾向于将有限的资源用于男童，家庭教育的选择可能会歧视女童。²⁸ 最贫困家庭的女童也不太可能有一个安静的地方专心学习和(或)得到必要的父母支持。²⁹ 失学女童由于要在照顾他人和家务劳动方面承担更多责任，也可能更难以参加远程学习课程。³⁰ 因此，当学校重新开学时，返校女童可能会减少。³¹

50. 在学校因疫情停课的情况下，数字鸿沟给农村社区的学生造成严重影响，将越来越多的女童排除在教育之外。根据儿基会的报告，70%以上无法获得远程学习替代方案的学生生活在农村地区。³² 对女童来说，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因为她们需要承担无偿照顾他人和家务劳动责任，这可能会阻碍她们充分有效地参与在

²⁵ 见 A/HRC/26/39。

²⁶ 儿基会，“COVID-19：对推进消除童婚工作的威胁”，2021 年。
见 <https://data.unicef.org/resources/covid-19-a-threat-to-progress-against-child-marriage/>。

²⁷ 联合国，“政策简报：COVID-19 对妇女的影响”，2020 年 4 月 9 日。见 <https://www.un.org/sexualviolenceinconflict/wp-content/uploads/2020/06/report/policy-brief-the-impact-of-covid-19-on-women/policy-brief-the-impact-of-covid-19-on-women-en-1.pdf>。

²⁸ 世界银行集团，“COVID-19 大流行的性别层面”，2020 年 4 月 16 日。见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3622/Gender-Dimensions-of-the-COVID-19-Pandemic.pdf?sequence=1&isAllowed=y>。

²⁹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消除 COVID-19 对儿童的影响”，2019 年。见 https://read.oecd-ilibrary.org/view/?ref=132_132643-m91j2scsyh&title=Combating-COVID-19-s-effect-on-children。

³⁰ 拯救儿童，“COVID-19：数百万人失学，危及西部和中部非洲儿童的未来”，2020 年 4 月 3 日。见 <https://www.savethechildren.net/news/covid-19-millions-out-school-jeopardising-future-children-west-and-central-africa>。

³¹ Antonique Koning, Jamie Anderson and Yasmin Bin-Humam, “Women in rural and agricultural livelihoods facing COVID-19”, 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 blog, 27 July 2020。见 <https://www.cgap.org/blog/women-rural-and-agricultural-livelihoods-facing-covid-19>。

³² 儿基会，“COVID-19：在学校停课期间，孩子们还能继续学习吗？——使用 100 个国家的数据对远程学习政策的潜在覆盖面进行的全球分析”，2020 年。见 <https://data.unicef.org/resources/remote-learning-reachability-factsheet/>。

线数字化学习。³³ 此外，在许多国家，信息和通信技术技能的培养青睐男童，而女童使用家用电脑和互联网的机会较少。³⁴

C. 获得服务的机会有限

51. 在世界许多地区，农村和城市地区之间在卫生保健方面继续存在严重的不平等，部分原因是农村地区较难获得卫生保健服务、卫生保健相关信息和文化上适当的服务。女童尤其受到这种情况的威胁。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52%的农村地区青春期女童和女青年无法就自己的保健做出决定。³⁵

52. 与普通民众相比，土著妇女和青春期女童从服务中受益的可能性甚至更小。³⁶ 此外，主流保健提供者往往轻视土著妇女和女童的传统保健做法，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³⁷ 农村残疾妇女和女童尤其有可能在性和生殖健康以及生殖权利方面受到限制。³⁸

53. 在农村地区，由于贫困、性别不平等、有害的文化习俗和性暴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女童最容易感染艾滋病毒，而在关键信息和服务方面女童尤其得不到充分服务。这一群体对艾滋病毒的了解程度较低，获得检测和现代避孕药具的机会较少。因此，青春期女童和女青年(15-24岁)的艾滋病毒感染率仍然非常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尤其如此。³⁹ 然而，关于艾滋病毒发病率的城乡分类数据很少，关于15岁以下女童的信息也很少。

54. 农村地区的青春期女童也容易受到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影响。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低收入地区和农村地区，一半的青春期女童每天吃不到三顿饭，而且由于性别文化规范，青春期女童往往缺少获得食物、教育和谋生机会的途径，所以特别容易营养不良。⁴⁰ 同时，青春期女童和育龄妇女的营养需求高于平均水平。

³³ 人口基金和儿基会，“针对 COVID-19 作出调整：转变人口基金——儿基会消除童婚现象全球方案以应对大流行病”，2020 年 9 月 23 日。见 https://www.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pdf/Responding_to_COVID-19_Pivoting_the_GPECM_to_the_pandemic.pdf。

³⁴ Diogo Amaro and others, “COVID-19 and education: the digital gender divide among adolescents in sub-Saharan Africa”, UNICEF Connect blog, 4 August 2020。见 <https://blogs.unicef.org/evidence-for-action/covid-19-and-education-the-digital-gender-divide-among-adolescents-in-sub-saharan-africa/>。

³⁵ 数据来自 28 个国家的基于人口的调查(2011-2016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 15 至 24 岁的所有女性中有 83% 生活在这些国家。见艾滋病署，《妇女和女童与艾滋病毒》，2018 年。见 https://www.unaids.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_asset/women_girls_hiv_en.pdf。

³⁶ 人口基金、儿基会和妇女署，“情况报道：土著妇女的孕产妇保健和孕产妇死亡情况”，(2018 年)。见 https://www.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pdf/factsheet_v20_French.pdf。

³⁷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署，《北京 25 年后的农村妇女和女童》。

³⁸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34 号一般性建议。

³⁹ 艾滋病署，《2020 年全球艾滋病最新情况报告：抓住时机——解决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以终结流行疫情》(2020 年，日内瓦)。见 https://www.unaids.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_asset/2020_global-aids-report_fr.pdf。

⁴⁰ 儿基会，《目标领域 1》。

55. COVID-19 大流行对女童等农村贫困人口的健康和营养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并可能导致在未来 12 个月内，又有 670 万 5 岁以下女童和男童患上消瘦症。这意味着儿童死亡人数每月会增加 10 000 多人，增幅 14%，主要发生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⁴¹ 在有些情况下，由于卫生保健中心和工作人员被转用抗击 COVID-19，农村地区的女童和其他人死于可治疗的疾病。

D. 性别暴力和有害习俗

56. 平均而言，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妇女在一生中会遭受性别暴力。根据妇女署的一项分析，在 26 个国家，丈夫或同居伴侣实施身体暴力或性暴力在农村地区比城市地区更为普遍。⁴² 考虑到农村妇女和女童报告此类暴力的可能性低于城市妇女和女童，这些数字可能会更高。⁴³ 经济和家庭压力，再加上疫情要求保持身体距离，导致全球范围内(包括农村地区)报告的性别暴力和家庭暴力增加。⁴⁴ 全球范围内，在所有被发现的人口贩运受害者中，19%是年轻女童，其中 72%的贩运目的是性剥削。⁴⁵

57. 残疾女童经常被强迫绝育或堕胎，特别容易受到性虐待和强奸，更有可能遭受性别暴力。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残疾女童比非残疾女童更易遭受暴力、剥削和虐待。⁴⁶

58. 在农村地区，女童更容易受到线上和线下的性虐待、骚扰、性勒索和诱拐。关于预防此类犯罪的公共信息匮乏、受害者难以举报虐待行为、性别陈规定型观念盛行等因素加剧了这种脆弱性。

59. 农村地区女童还更容易受到童婚和切割女性生殖器的伤害。在所有地区，农村地区女童比城市女童更有可能结婚。这意味着，每年有约 1 500 万名女童在年满 18 岁前结婚，其中大多来自南亚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最贫困的家庭和农村地区。⁴⁷ 全世界接受过女性生殖器切割的女童和妇女的确切人数仍然不明。

60. 由于疫情造成的学校停课和社会限制，童婚数量有可能大规模增加。儿基会指出，由于这场疫情的直接影响，在本十年结束之前，可能还会增加 1 000 万例

⁴¹ Henrietta Fore and others, “Child malnutrition and COVID-19: the time to act is now”, *The Lancet*, vol. 396, No. 10250 (27 July 2020)。见 [https://www.thelancet.com/article/S0140-6736\(20\)31648-2/fulltext](https://www.thelancet.com/article/S0140-6736(20)31648-2/fulltext)。

⁴² 妇女署对人口和保健调查方案统计汇编数据库中的数据所作分析，可查阅 www.statpiller.com。

⁴³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署，《北京 25 年后的农村妇女和女童》。

⁴⁴ Koning, Anderson and Bin-Humam, “Women in rural and agricultural livelihoods”。

⁴⁵ 《2020 年全球人口贩运问题报告》(联合国出版物，2021 年)。见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tip/2021/GLOTiP_2020_15jan_web.pdf。

⁴⁶ 见 E/CN.6/2018/3。

⁴⁷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和儿基会，“修复破灭的全民教育承诺：失学儿童全球倡议的研究结果”(2015 年，蒙特利尔)。见 https://www.unicef.fr/sites/default/files/userfiles/realiser%20promesse%20non%20tenue%20education_2015.pdf。

童婚。⁴⁸ 这场疫情还有可能逆转到 2030 年消除切割女性生殖器做法工作取得的进展，并导致童工数量自 2000 年第一次全球估计以来首次增加。⁴⁹

E. 气候问题

61. 世界各地的农村地区正在遭受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这也加剧了现有的性别不平等，加重了妇女和女童的苦难。⁵⁰ 由于流动性、决策权和应享权利有限，农村地区的妇女和女童特别难以化解气候危机造成的冲击和后果。⁵¹ 例如，气候干旱会妨碍水和燃料的收集和储存，而这些任务通常由农村地区的妇女和女童承担。由于她们需要花更多时间来完成工作，这既增加了工作量，又影响了安全。她们获得生产性资源和服务的机会有限，这也限制了她们在采用气候智能型做法方面的知识和能力。⁵²

62. 疫情和气候变化引发的社会经济危机对农村社区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尤其影响到土著社区和少数群体、妇女和女童以及其他边缘群体。⁵³ 尽管如此，农村地区的妇女和女童凭借其独特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继续为适应和减轻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研究表明，农村女农民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的本土作物、采用低碳技术、传播知识和敦促领导人采取行动实现可持续解决方案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⁵⁴

F. 土地权

63. 对于农村家庭来说，由于土地对农业生产以及提供粮食安全和营养至关重要，因此往往是最重要的家庭资产。然而，在许多国家，农村地区的妇女和女童在继承、拥有、使用和控制土地方面的机会有限，权利不平等。⁵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⁴⁸ 儿基会，“COVID-19：对推进禁止童婚工作的威胁”。

⁴⁹ 人口基金，“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对计划生育以及制止性别暴力、切割女性生殖器和童婚的影响”，临时技术说明，2020 年 4 月；劳工组织和儿基会，“COVID-19 与童工：危机时刻，行动时刻”，2020 年。见 https://www.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pdf/COVID-19_impact_brief_for_UNFPA_24_April_2020_1.pdf；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ipcc/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7422.pdf。

⁵⁰ Rajendra K. Pachauri and others, eds., *Climate Change 2014: Synthesis Report* (Geneva,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15)。见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2018/02/SYR_AR5_FINAL_full_fr.pdf。

⁵¹ 粮农组织，“农村妇女”。

⁵² 粮农组织和援外社，《将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纳入气候智能型农业方案的良好做法》(2019 年，亚特兰大)。见 <http://www.fao.org/3/ca3883en/ca3883en.pdf>。

⁵³ Rachel McMonagle, “Secure land rights: a sustainable solution at the intersection of climate change and COVID-19”, Skoll Foundation, 20 September 2020。见 <https://skoll.org/2020/09/20/secure-land-rights-a-sustainable-solution-at-the-intersection-of-climate-change-and-covid-19/>。

⁵⁴ Venge Nyirongo, “Rural women’s economic empowerment and the road to 2030: agency for climate action”, *UN Chronicle*, 15 October 2019。
见 <https://www.un.org/fr/chronique-onu/1%E2%80%99autonomie-%C3%A9conomique-des-femmes-et-le-chemin-vers-2030-%E2%80%93-mobilisation-pour-l%E2%80%99action>。

⁵⁵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署，《北京 25 年后的农村妇女和女童》；A/74/246。

织指出，至少 60%的国家仍然在法律或实践中歧视女儿继承土地的权利。⁵⁶ 这限制了她们进行长期规划的能力，降低了她们的粮食安全。⁵⁷

64. 这场疫情加剧了农村妇女和女童在土地权方面的脆弱性。疫情期间，丧偶妇女在丈夫去世后可能被剥夺继承权并失去土地使用权。由于失业移徙工人返乡增加了对土地和资源的压力，她们的土地保有权保障也受到了威胁。农村地区的一些妇女和女童正面临着有些人利用疫情动荡侵占土地的问题。⁵⁸

G. 劳工和农业问题

65. 在发展中国家，43%以务农为生的人口是妇女和女童。童工在农村地区很常见，女童是农业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女童通常比男童更有可能既从事农业劳动又从事家务劳动。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村和土著女童和女青年更有可能从事非正式工作，其价值被低估，工资低，工作时间长，获得社会保护、收入保障和适当卫生保健的机会有限。⁵⁹

66. 农村和土著妇女和女童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家务，包括取水打柴、加工和准备食物、长途跋涉和搬运家用物品与产品以及照顾他人。这些任务没有报酬，限制了女童的时间和流动性，使她们上学的时间更少，并有可能遭受更多的骚扰和暴力。

67. 由于性别权力失衡、工作场所缺乏监督以及在偏远地区独自工作，在农村地区等较贫困地区工作的女童和妇女更有可能被贩卖和剥削。⁶⁰ 家务劳动等部门具有“隐蔽性”，助长了剥削做法和贩卖女童行为。⁶¹ 此外，家庭童工往往更容易受到剥削性工作条件的伤害，而这些童工通常是从农村搬迁到城市地区的女童。⁶²

五. 建议

68. 各国和其他相关行为体可实施跨领域的综合政策和方案，以解决对农村地区女童多种形式的歧视问题，并应对青春期女童生活的多层面问题。这些政策和方案可以听取农村地区女童的意见，特别是关于从 COVID-19 大流行中恢复的意见。这些政策和方案还可以优先努力改变导致歧视性思维的社会、文化和传统规范。

⁵⁶ 儿基会、妇女署及国际计划，《女童的新时代：评估 25 年来的进步》，2020 年 3 月。见 <https://www.unicef.org/media/65586/file/A-new-era-for-girls-2020.pdf>。

⁵⁷ 粮农组织，“增强妇女权能，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粮农组织和非洲联盟发起关于性别和农业粮食体系的区域展望”，2020 年 10 月 28 日。见 <http://www.fao.org/news/story/fr/item/1319950/icode/>。

⁵⁸ McMonagle, “Secure land rights”。

⁵⁹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署，《北京 25 年后的农村妇女和女童》。

⁶⁰ 劳工组织，“农村女工：弥补差距”，2018 年 3 月 8 日；以及 Kieran Guilbert, “Traffickers found targeting more children as COVID-19 school closures fuel danger”, Reuters, 2 February 2021。

⁶¹ 《2020 年全球贩运人口问题报告》。

⁶² 劳工组织，《消除童工现象和保护青年家政工人实用指南》(2017 年，日内瓦)。见 https://www.ilo.org/ipecc/Informationresources/WCMS_IPEC_PUB_30535/lang--fr/index.htm。

69. 各国和其他相关行为体可推动法律和政策改革，系统地解决影响农村地区女童的各种问题，包括财产权和土地权、资源控制、有害的文化习俗、暴力、剥削和虐待以及缺乏获得服务、技术和参与的机会。这样的改革可包括加倍努力，消除童工现象。
70. 各国和其他相关行为体可增加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敏感对待性别问题的社会保护方案、经济安全网和减贫方案，通过这些努力满足农村地区女童的独特需求，防止疫情加剧贫困和排斥。
71. 各国和其他相关行为体可制定干预措施，消除阻碍农村地区女童获得优质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机会的结构性障碍和其他障碍。为此需要对公平可及的教育系统、方案和大流行病应对计划进行投资。
72. 各国和其他相关行为体可改善提供给农村地区女童服务的可及性、可负担性、公平覆盖面和质量，并特别考虑到青少年的需求，包括身心保健，性和生殖健康及生殖权利，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及营养服务，以及预防和应对艾滋病毒、性别暴力、切割女性生殖器和少女怀孕方面的支持。此外，女童本身也应参与设计和提供服务。
73. 各国和其他相关行为体可推动制定将童婚定为犯罪的立法，开展运动反对视童婚为正当做法的看法，增加农村地区女童接受优质安全教育的机会，加强面临童婚风险女童的自主决策能力，并为已婚女童提供支持。
74. 各国和其他相关行为体可加强农村地区的多部门儿童保护系统，以防止暴力，并确保为可能遭受或已经遭受暴力、剥削和虐待的女童提供全面支持。需要特别注意帮助农村地区的残疾女童和其他边缘化女童。
75. 各国和其他相关行为体可积极创造机会，让农村地区的青春期女童能够发声建言，并能在家庭、社区和政治进程中影响那些左右她们的生活、身体、教育、职业和未来的决定。
76. 各国和其他相关行为体可履行对可持续农村发展和性别平等的承诺，为此制定促进性别平等的气候变化框架和战略；推动促进性别平等的气候融资、基础设施、服务、技术和社会保护；推广性别平等的气候智慧型农作方法；并承认妇女和女童的传统生态知识。
77. 各国和其他相关行为体可促进政策、方案和投资，以推动农村家庭内部更多地分担家务和护理工作责任，为妇女和女童提供创业等更广泛的谋生机会，并推动农业部门开展性别平等改革。
78. 各国和其他相关行为体可系统地投资收集按性别、年龄和地点分列的发展和人道主义数据的工作，这对于交叉分析农村地区女童的遭遇和制定更多循证政策和方案至关重要。

79. 各国和其他相关行为体可调动资源，在农村地区增加性别包容和年龄包容的长期投资，其中包括通过预算拨款进行的公共投资和激励相关私营部门进行的投资。
